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卜子夏与三晋儒学

高志诚

/ 著

孔夫子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
人”，卜子夏
是最有成就
者之一。他是
山西历史上
最早的思想
家，也是三晋
儒学的开创
人。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审:田红
终审:张安塞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卜子夏与三晋儒学/高专诚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2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5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453-X

I. 卜… II. 高… III. 卜子夏—评传
IV. B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106 号

7. 元好问

8. 元代名儒郝经

9. 明清启蒙思想家傅山

10. 儒贾融汇活常家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5辑

卜子夏与三晋儒学

高专诚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203-04453-X
K·241 定价: 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

- 1 叔虞封唐
三家分晋
- 2 卜子夏与三晋儒学
- 3 赵武灵王与胡服骑射
- 4 唐代名相狄仁杰
- 5 宰相世家:河东裴氏
- 6 汾阳王郭子仪
- 7 元好问
- 8 元代名儒郝经
- 9 明清启蒙思想家傅山
- 10 儒贾融汇话常家

目 录

一、子夏生平事迹	(2)
1. 籍贯与家世	(2)
2. 孔门求学	(4)
3. 终老西河	(6)
二、子夏思想的特色	(8)
1. 子夏与儒家典籍	(8)
2. 子夏的政治思想	(9)
3. 子夏之“学”	(13)
三、子夏儒学的发展	(15)
1. 子夏弟子的去向	(15)
2. 子夏儒学的传承	(20)
四、子夏之后的三晋儒学	(25)
1. 三晋儒学在魏国的衰落	(25)
2. 三晋儒学在赵国的兴衰	(27)
3. 三晋儒学与韩国政治	(35)
4. 三晋儒学在秦国	(36)
五、子夏儒学的精髓	(39)

引 子

子夏姓卜名商，是著名的孔子弟子，也是春秋战国时代三晋地区著名的思想家。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据说门下弟子先后有三千多人，其中有七十多人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孔子在世时，曾从道德修养、政治成就、外交才能和社会科学等四个方面总结了门下杰出弟子的成就，而子夏则位列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成就的弟子之中。孔子去世后，至少有四位年轻弟子勇敢地挑起了继续孔子未竟事业的重任，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被后人称为“孔子四杰”，子夏也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儒学史上，孔子是儒学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就落在了孔子弟子们的肩上。在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方面，来自三晋地区的子夏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由于与同门弟子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孔子去世后，子夏回到三晋，在魏国的西河地区从事教育活动，直到离开人世。子夏一直担任魏国君主魏文侯之师，还收授魏国的一些重要大臣为弟子，并通过这样的途径影响三晋国家和三晋政治，使子夏儒学成为三晋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子夏弟子遍天下，其中也不乏卓有成就的思想家，这使得子夏儒学得以广布天下。子夏去世后，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以及子夏弟子的不同取向，子夏儒学未能在三晋地区现实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在三晋社

会的各个方面，子夏儒学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着。特别是在三晋思想史方面，子夏儒学不仅终于孕育出像荀子这样的硕儒，还深刻影响了三晋法家思想的成型和发展。

子夏是三晋历史上最早的思想家，也是三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子夏儒学是三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子夏生平事迹

1. 籍贯与家世

子夏出生在春秋与战国时代相交替的时候。在那样的时代，由于各国间不断发生战争，许多地域的归属权也就不断地变更。子夏的里籍在周朝初年是当时的温国。西周时代，温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小国，本在周朝东都洛邑（史称“成周”，在今河南洛阳）的范围之内，受封者是苏忿生，当时担任周朝廷的司寇。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50年）温国为狄人所灭。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平定周室之乱有功，周襄王就把温地赏赐给晋国，温国最终为晋国所有，此时距子夏出生（公元前507年）还有一百多年。到了春秋末期，温邑属晋国大家族魏氏；三家分晋后，温邑归附魏国。所以，当春秋末年子夏出生时，他可以说是晋国人；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他就应当是魏国人了。温国故地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15公里。温县地处黄河

北岸，地势平整开阔，又有黄河灌溉之利，自古就是小麦的丰产之地。春秋时代天下大乱之际，每到麦穗泛黄的季节，这里经常是诸侯逞兵、抢夺小麦的战场。到了战国时代，这里又逐渐成为魏国有名的商业城市，更加强了它的经济发达的程度。所以，在整个周朝，温国的经济应该是相对发达的，这里的人们过着比较安逸富足的生活，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应该有相当的高度。

子夏姓卜名商，子夏是其字。“卜”字在甲骨文中为“占卜”之义，卜辞中也有“卜某”之类的固定称谓。一般认为，在殷商和周朝都有专职的卜官。卜商以“卜”为姓，也许可以证明其祖上曾担任过卜官之职。在当时，卜官在朝廷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子夏的名字中，夏、商二字为周朝之前的两个朝代。这种对历史的看重，说明子夏的家族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而具有文化根源的家族，在那种时代通常都是贵族世家的后裔。

子夏生于公元前 507 年，孔子去世时（公元前 479 年），子夏 29 岁，据此推断，子夏应当在孔子晚年进入孔门。众所周知，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并不是针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而是对成年人进行的文化和政治教育，所以，就学于孔门的人都得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孔门立学的时代，只有贵族世家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接受像样的教育。然而，根据记载，到子夏出生的时代，他的家族（至少是其家庭）已经陷入贫困。也就是说，当子夏本人出生时，他的家族或家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甚至可能沦落为贫贱之家，但其家族或家庭之中，应当还有相当

的文化传统，使子夏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当今天子夏故里，有许多关于子夏的传说。在此类传说中，子夏的基本家庭状况是孤儿寡母。为了养家，少年时的子夏就得耕地打柴；更有甚者，说子夏为了学习文化，不得不在学堂之外偷听老师的讲课。显然，这些传说不免有些想象和夸张，但对于子夏少年时代的困顿生活的基本确认却是不无根据的。

2. 孔门求学

子夏一生的思想成就与求学于孔子门下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关系。子夏少孔子44岁，孔子去世时，子夏不过29岁。在记载孔门言行的《论语》中，明确指出子夏曾做过鲁国莒（jǔ）父地方的行政长官，并在担任这个职位时向孔子“问政”，即请教如何治理属下的方法。其实，在平时的孔门问学中，子夏就与孔子及同门求学者探讨过一些普遍性的政治问题。不过，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子夏是如何得到这一职位的。

不论莒父是鲁国的大城镇还是小城邑，在当时，要担任这一级的行政官员，一定需要相当的文化基础。在子夏时代，做官的正规途径基本有两条，一是依靠贵族世家享有的世卿世禄制的特权继承官位，即子辈继承祖父辈的官职；一是以军功取仕，即因为战功卓著而获得职位。子夏并非武人，以军功获得官职基本上不太可能。另外，即使子夏具有贵族血统，可他本人却出生于贫贱之家，显然已经失去了继承官职的可能；况且他又是晋国温地之人，要

想直接获得鲁国的官职也并非易事。所以，子夏的做官只可能与求学于孔门有关。事实上，在孔子时代，传统的做官途径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去过多地考虑一个人眼下的社会地位，而专以实际才能作为任用官员之主要条件的做法正在各国逐渐出现。在鲁国，由于孔子的推荐，许多孔子弟子得到了官职，因为当权者认识到孔子门下的许多弟子已经具备了做官的基本素质和才能。具体到子夏，就是因为经受了孔门的熏陶，有了孔子弟子的身份，这才去做了官。

那么，青年时代的子夏是如何求学于孔门的呢？史籍对此并无明确记载。孔子一生没有到过晋国，他晚年周游列国，对晋国也是止足于黄河南岸。孔子曾有跨黄河入晋国的打算，但却因为听说晋国发生了政治内乱才打消了入晋的念头。也许正在这个时候，生活在黄河北岸边的子夏，毅然过河求学，成为孔子的后期弟子之一。

不过，现在看起来，子夏究竟如何进入孔门并不是最要紧的问题。重要的事实是，根据《论语》和其他典籍的记载，在孔门中，子夏因为对《诗》的精研而被孔子肯定为“文学”弟子。孔子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当时所谓“文学”，是指典章文物；而孔子所说的子夏的“文学”成就，就是肯定了子夏对于历史文献和政治制度的研究所得。总之，子夏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他在孔门中令人瞩目，以至于一些同门弟子在遇到思想困惑之时也每每向子夏请教。

孔子弟子以各具特色的思想取向而闻名，对此，孔子

本人予以积极的肯定。具体到子夏，他的主要思想是“学以致用”，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学以致用。在当时的孔门上下，政治追求是第一位的，所以，子夏的“学以致用”也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具体运用所学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原则。本着这个想法，经孔子举荐，子夏去莒父做了邑宰，尝试着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可是，子夏做官后不久，孔子就去世了。孔子之死对于孔门弟子的思想和政治去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弟子之间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表面化，开始出现了面对面的思想交锋。尽管这种思想争议只是同一思想派别内部的分歧，但就子夏而言，因为他的思想与鲁国本地的所谓“缙绅之儒”的思想主流分歧特别严重，加之他所禀赋的三晋之人的耿直性格，使他深深感受到了在鲁国遭受到的沉重的思想和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从他的一贯的政治思想来看，子夏并不是为做官而做官的人。既然子夏的哲学思想在鲁国受到同门的排斥，而这些同门之人也有在鲁国做官的，那么，子夏的政治理想和作为就会遭到反对，这对他的仕途肯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面对这种处境，子夏不可能不会产生离开鲁国的念头。而恰好在此时，魏文侯向子夏发出了邀请，子夏便踏上了回归故乡之路。

3. 终老西河

子夏回到魏国之后，在魏国的西河地方设帐教授弟子，传播孔子的思想学说，同时还担任魏文侯的私人教师。子

夏所居之西河，正处在当时魏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大概就是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北部之间。至于子夏做魏文侯之师，很可能是因为尚未继位的年少的魏斯（文侯），因为喜好古来圣贤的思想和政治成就，在得知孔子门下有本乡之人子夏后，便主动聘请子夏回到魏国作他的老师。

子夏在魏国作了国君之师，这是他一生中最高世俗成就，从此以后，做帝王之师就成为儒家人士的政治追求之一。周朝的历史在魏、韩、赵“三家分晋”之后进入战国时期，而在战国初期，作为一个新兴的诸侯国，魏国表现出了勃勃生机，一时间几乎是天下莫敌。魏国在这一时期的强盛，与魏文侯的宏图大志和非凡才干是分不开的。显然，身为天下强国之君主的教师，子夏的声望在当时自然是相当崇高的。在那个时代，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终身担当国君之师，确实是空前的殊荣。

身为国君之师的世俗地位，加之又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他本人也确实具有真才实学——这些条件合在一处，子夏门下弟子的盛况可想而知。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子夏弟子中既有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有卓尔有成的思想家。不论这些人的成功是在投师于子夏之前或之后取得的，都说明了子夏在当时的影响力是相当巨大的。

子夏一生终老于魏国西河。在温地的传世记载中，虽然也认为子夏自离开之后就没有回来过，但也说子夏去世后最终归葬于他的出生之地。在今天的河南温县还有子夏的墓地，当地政府甚至还为子夏立碑建祠，由其后人守侍，供世人瞻仰凭吊。卜氏后裔千百年来虽然遍布海内外，但

却都归宗子夏，奉之为圣祖。同时，西河故地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子夏的功绩。在山西河津县，人们保护和修缮子夏遗迹，并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卜氏先贤，宣传其思想成就。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子夏其人其学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作为魏文侯之师的子夏在其有生之年肯定是充分享受了人间的荣华，但是到了晚年，子夏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如意之处。据记载，因为儿子的不幸去世，子夏竟然因痛哭不已而失明。远在鲁国的同门曾子，尽管与子夏有着绝大的思想分歧，此时也赶到西河来安慰子夏。子夏后半生之所以选择了远离鲁国同门的生活，除了他一直深受魏文侯的礼遇这一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开辟一条与鲁国儒生不同的孔子思想的发展路线；而从子夏一生的思想努力和成就来看，这条不同的路线确实是颇具特色的。

二、子夏思想的特色

1. 子夏与儒家典籍

在历史上留下名姓和业绩的孔子弟子都有其独到之处。孔子在世时曾把当时就有成就的弟子分为四类，史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子夏与子游一道位列“文学”之科。

在孔子时代，“文学”一辞专指文物典章和礼乐制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而子夏则尤其擅长对自古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的研究。孔子曾充分肯定了子夏对《诗

《经》的某些诗篇的看法。子夏对经籍的研究，不仅限于思想评说，还有文字方面的考核。据记载，有一次，子夏经过卫地时，一位读晋史的人将标明时间的“己亥”二字错读为“三豕”，子夏便马上予以纠正。孔门众多弟子各有所求，但在研究典籍并将研究所得运用于实际方面，子夏的确付出过特殊的辛劳，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到了汉代，由于朝廷明确地把儒家经籍规定为正统经典，这些经籍的传承脉络就成为学术界的主要论题之一。因为子夏在儒家经籍研究方面颇有成就，汉儒便把许多儒家经典最早的传承之功归于子夏，认为正是子夏把孔子所校正过的典籍传授给后人。尽管这种归结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但是，子夏在传统典籍方面的深厚修养，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子夏的政治思想

从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传播的角度看去，孔子弟子中最有成就的莫若曾子、子夏二人。对于子夏来说，因为有过从政的经历，对于现实政治具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思考；另外，在其后半生，子夏又用自己的政治思想指导了魏国和“三晋”政治，所以，他在政治思想方面逐渐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系统思想。

孔子晚年时，子夏受孔子举荐，做了鲁国莒父的邑宰。孔子则一边教导身边的弟子，一边不时地访问为官弟子治下的地方。当孔子来到莒父时，子夏就“问政”于孔子，孔子则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严肃的建议和批评。根据子夏的

思想特点和政治举措，孔子提出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认为子夏的政治指导思想倾向于“欲速”，即急于求成，很想一下改变所管辖地方的状况；二是指出子夏的政治措施容易流于“见小利”，即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具体说来，在孔子的意见中，前者是劝告子夏不要一心只想着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不能使他满意的社会现状，后者则是“欲速”的具体表现，即从“小利”上入手。孔子在此所说的“利”，是指现实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就子夏而言，“见小利”当然不会是谋取私利，也不会是单纯地增加当政者或政府的收入，因为如果是这样，孔子会有更严厉、更直接的批评。所以，孔子所说的子夏的“见小利”肯定是想改善普通人的物质生活。那么，孔子对子夏之“见小利”的批评，难道是反对改善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吗？显然不是。孔子也曾倡导“足食”，要求保证民众的物质生活；但是，从治国的根本精神上来说，孔子认为应该把端正政府的治国思想放在首位。

那么，什么才是孔子所要求的治国的根本精神呢？孔子晚年时，子游担任鲁国武城的邑宰。当孔子考察子游治下的武城时，却在这个小地方听到了“弦乐之声”，即用周朝正统的音乐来熏陶和教化普通百姓的做法。孔子对此大为吃惊，就对子游开玩笑说，杀鸡怎么能使用宰牛的刀子呢？而子游则一本正经地引用孔子曾经说过的话反驳说，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应该让他们明白最高的政治原则。听了子游的批评，孔子也意识到自己的玩笑话有些过头，便马上作出了自我批评，并且明确肯定了子游把“礼乐”之教

放在政治首位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实际的治理国家或社会的过程中，孔子并不认为应该先去进行道德教化，待教化成功之后再安排民众的物质生活。事实上，在孔子看来，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具体操作上，二者齐头并进，但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当然，在具体落实孔子的这种政治方针时，要把握好德教与求利二者之间的平衡的确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子夏才认为，因为道德教化属于思想范畴，容易流于空洞；而要想让民众相信在上位者的道德训诫，必须首先取得民众的信任。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子夏认为必须从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方面入手，因为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换句话说，在上位者如果连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无法保证和提高，却还要求他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达到某种高度，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一个让民众反感的在位者，他所宣讲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显然是无法扎根于民众的头脑之中的。

晚年的孔子虽然不担任官职，但是，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司寇，对实际的政治运作和政治举措的长远影响，也有过切身体会。所以，在实际政治经验方面，孔子当然比子夏更胜一筹。孔子真正想告诉子夏的是，强调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基础，但是，如果在某个时期完全把发展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失控。特别是在孔子和子夏时代，现实政治基本上还处在人治或专制的时期，一切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政治权力的运作缺乏外在制度的有效监督和约束。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当政者认为此时此刻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就很容易使社会成员以“利”衡量一切。而专制社会一旦发展到惟利是图的地步，道德教化就难以下手，更不要说有效施行了。

孔子的告诫并未彻底改变子夏的政治追求。这种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路途毕竟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就孔门思想而言，正是有了像子夏这种的颇具个性化的表现，才使得早期儒家思想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根据子夏的政治思想，要想从发展经济入手取得民众的信任，势必要加强当政者的权威。为此，子夏强调指出，当政者应当利用其特殊地位推进其政治事业。子夏认为，当政者不应该姑息养奸，而是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便长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与他重视民众物质生活的主张是一致的。不论是想取得民众的信任，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都是以当政者的地位牢固、政令通畅为前提的。

子夏的这份执著，一方面反映了子夏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以子夏为首的三晋儒学独自的发展方向。尽管子夏在三晋施教的目的是传播孔子思想，但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与孔子有所不同。以子夏为首的三晋早期儒学在坚持孔子基本思想的同时，结合三晋之地的具体情况，在强调发展经济、注重实用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主张，并以此在政治上与齐鲁之儒相区别。

子夏亲受孔子教诲，虽然看重学以致用，重视民众的物质生活，但在总目标上还是想实现孔子儒学以道德治国